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 国际关系

主编 程早霞 曲晓丽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主 编 程早霞 曲晓丽
副主编 姜 鹏 戴道昆 张 辉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介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与未来发展走向等内容。全书力求内容全面、体例科学、论述得当、用语规范、文字简洁、通俗易懂,辅以最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数据与政治动态,确保学生能够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掌握实用知识。

本书主要适用于在大专院校本科生中普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形势知识,旨在对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进行提升与塑造,进而对其知识结构进行优化与完善。通过帮助学生掌握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知识以逐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程早霞,曲晓丽主
编.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5. 2
ISBN 978 - 7 - 5661 - 1003 - 9

I. ①当… II. ①程… ②曲… III. ①国际政治②世
界经济③国际关系 IV. ①D5②F112③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0527 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 - 82519328
传 真 0451 - 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 张 13. 2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 0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序 言

如果说当今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理程是霸权护持,那么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理程就是大国崛起。从时间向度来讲,我们国家正处于高速崛起的进程之中;从空间向度来讲,我们国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与霸权国的权力位差正在逐年收窄;从目的向度来讲,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互动迫切需要学术界对权力、制度、价值、角色、身份等问题进行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本项研究正是基于上面三个认知维度而展开的。从根本上讲,本书就是围绕着“世界什么样”和“中国怎么办”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发挥作用的变量进行的探索,以期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为中国和平崛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避免崛起进程中的战略误判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认知框架。

纵观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的二元关系可以发现,虽然崛起国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地缘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其战略中的某些共性仍然能够彰显出基于主观能动性的战略规划对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战略机遇期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主动创造与寻找的结果。一个好的国际战略操盘手应该像是一个会驾驭风帆的水手,不论风向如何他都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对于大国崛起来讲,崛起国应该如何积极主动地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成为本书着重探讨的焦点问题。而如何确定当今国际世界的“风向”,以便更好地制定最符合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则是本书主体部分研究当今体系格局的出发点。

法国国际政治学者雷蒙·阿隆曾经说过:“庸人看待国际关系每一天都是新鲜的,而智者看待国际关系每一天都是不新鲜的。”一本好的国际关系著作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信息的采集与整理,也不应盲目地追求昙花一现的学术潮流,其更应该去探讨一些带有长期和普遍指导意义的学术命题。如果没有国际政治哲学的指导,智慧会湮没在知识里,知识会湮没在信息里。正因为如此,本书从探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入手,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观察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框架与认识方法。如果说本书的出版具有某种学术价值,那么它并不是要试图照彻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的宏达屋宇,它可能就像是一道手电的光亮,通过这道光亮帮助我们寻找到通向世界之门的最近路程。

与曾经以欧洲社会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不同——那时候在国际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英法德这样的中等国家——今天的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洲级大国”时代。美国、苏联、欧盟、日本、印度和中国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一个核心标的与研究样本。这些洲级大国有着巨大的基本实体、文化惯性、战略纵深与资源禀赋。未来擘画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个前提就

是要充分认清我们所处的世界格局,以及体系所蕴含的主导性规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把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面貌与未来走势。

最后,牛津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句著名的校训,那就是“我们拒绝做傻瓜”。真心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普及国际关系知识的通俗读本,并能够帮助更多的国人摆脱在国际问题认知上的思维定式与逻辑上的路径依赖。如果当你阅读完本书的内容之后能够发现自己比阅读之前变得更“聪明”一些了,变得不再那么人云亦云了,变得去敢于质疑千篇一律的常识了,那可能就是本书最大的作用了。

编 者

2014 年 6 月

目 录

导论 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逻辑	1
第一章 世界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	23
第一节 二战前世界格局的发展态势	23
第二节 雅尔塔体系——冷战	28
第二章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	41
第一节 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41
第二节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	45
第三节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48
第三章 美国的世界霸权之路	53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53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58
第三节 二战后美国雄霸世界	63
第四节 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	67
第四章 苏联的历程与俄罗斯的复兴	69
第一节 俄国的建立及兴起	69
第二节 俄国的衰亡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73
第三节 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的崛起	76
第五章 日本的战败与崛起	86
第一节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	86
第二节 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	89
第三节 日本的军事政治大国梦	93
第六章 欧盟的缘起与发展	100
第一节 欧洲联盟的渊源	100
第二节 欧洲联盟的成立	103
第三节 欧洲联盟的发展	108
第四节 欧洲联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13
第七章 印度的南亚崛起之路	117
第一节 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	117

第二节 印度的对外政策与南亚战略	119
第三节 印度与大国间关系	122
第八章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	132
第一节 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132
第二节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137
第三节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	140
第四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	143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的艰难旅程	148
第一节 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	148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	150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革	152
第十章 中国对外关系与热点问题	158
第一节 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脉络	158
第二节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161
第三节 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164
第四节 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170
第十一章 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178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论	178
第二节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	185
第三节 全球治理的发展困境及趋势	192
参考文献	198
后记	203

导论 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与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仅面临着历史经验的“驱动”,同时也面临着创造和平未来思想逻辑的“引导”。“历史的真实”与“逻辑的真实”在理论的继承与变革中交汇分离,构成了研究现代国际关系演化路径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忘却历史者必将重蹈覆辙,那么被历史记忆束缚的人将永远无法进步。理论批判是带有积极意义的破坏性建设,只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才能取得突破与发展。也只有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让新的理论更好地指导政治实践。

面对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许多人会产生一种疑问,即哪一种理论流派能够更加清晰地解读当今的国际政治?坦率地讲,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基本态势就是“诸侯众多,但无一只独大”。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纷争与融合,各种学派在核心假定问题上已经无法进一步延续通约化的趋势。现代国际政治就像是一个多面体的屏幕,而每面屏幕上都演绎着不同的生活。正如一个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年轻人很难相信国际社会未来会进入到建构主义所宣称的世界社会一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北欧地区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他们的地区将重返霍布斯主义的丛林文化。因此,与其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不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不同村落组成的国际社会。而针对不同的村落——我们也称其为区域国际社会或亚体系——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理论范式进行观察与解读。

理论是在片面中谋求深刻的逻辑链条。理论是对某一个时段内的现实世界的不完全抽象认知,而抽象本身就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人为扭曲与文本诠释。因此,理论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它对世界百科全书式的整体归纳,而在于其自身逻辑的美感。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父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民主政治的式微》一书中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来解释变化无常的世界政治实践,而是向政治实践进程中的载体注入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观念,以便引导国际政治向积极变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演化。”^①因此,对于当代众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研究,既不能抱着“一招鲜,吃遍天”的取巧态度,同时也要避免陷入到“重实战,轻理论”的虚无态度。因为即便是声称自己不需要在任何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就可以作出外交决策(不管这样的决策有多糟糕)的政治家,他们也是在一套存在于自身潜意识中的比较朴素的理论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真研习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所在。

一、主流理论的历史嬗变:三次论战与两大失败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历程不

^① Hans Joachim Morgenthau. 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politic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在“三次论战”与“两大失败”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每一次激烈的论战都没有彻底否定一种理论,而是导致了不同理论在辅助假定上的融合;每一次预测的失败都没有宣告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是激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界同仁们对现有理论框架更大的反思与努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激辩与融合、失败与反思中逐渐地走向成熟与完善。

(一)理论界的三次大论战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所经历的三次大论战分别是:理想主义同古典现实主义间的论战;新现实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以及后实证主义理论同传统实证主义理论之间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派系的形成与融合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关系宏理论的突破仍将以学派间的论战为主要方式。

1. 理想主义同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战

自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署以来,围绕“权力均衡”这一核心概念衍生出的古典现实主义逻辑便一直主导着近代西方国际社会的互动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发现传统的“均势”理念不仅难以限制战争的烈度,同时,还成为诱发欧洲地区陷入难以自拔的总体战的渊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第一次被推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界舞台的中心。一时间,以美国式的“理想主义”理论对传统欧洲式的“权力政治”的围剿与批判充斥着整个国际社会。

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约翰·莫里、大卫·戴维斯、约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以及尼古拉斯·巴特勒等人。将形形色色观点迥异的人汇聚到一起并为他们贴上“理想主义”的学术标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述学者们在观念中都相信国家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限制国际战争,甚至是最终消弭国际战争。一战后“威尔逊学派”的学者们都认为:“战争不是人性中注定的产物,它只是那种人性放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结果。”^①正是传统欧洲“秘密外交”、“军事联盟”和“权力均衡”的长期存在才使得国际政治中带有明显的权力竞争色彩。人与国家是可能通过后天的培养与教化而向善的,并进而推出由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行为是可以放弃“强权政治理念”而被改造成“依靠法治”与“国际组织”而重建秩序的。

理想主义同古典现实主义的学术分歧主要表现为四个具体方面:首先,理想主义学者们认为人性并不是像古典现实主义所假定的充满着内生的权力冲动;其次,理想主义认为,战争是由于人们缺乏学习造成的。“秘密外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在战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只要给人们公开参与外交的机会,战争就可能被避免;再次,国家间的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因此冲突和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者们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和平的需求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最后,理想主义者认为,在维护世界安全问题上,建立国际联盟以及运用集体安全、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力量是取代传统军事同盟,以至最终消弭战争最有效的保障。

面对一战后理想主义的强势登场,现实主义理论在1930年之前一直呈现出明显的式微与衰落态势。1925年诞生的《洛迦诺公约》和1928年诞生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说

^① G Lowes Dickinson.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war[M]. Harpress Publishing, 2012.

明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欧洲国际政治的影响。但是,随着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化,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再一次退回到古典现实主义所关注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权力等问题之上。直到1939年爱德华·卡尔的一本《二十年危机》的问世,它连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将理想主义扔进了理论的垃圾堆。从此,人们普遍倾向于将理想主义的学术观念与“幼稚”和“无知”等同在一起。

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谱系中,古典现实主义因其理论渊源久远、下辖的子理论众多而包揽了众多大师级学者。在汤姆逊《国际政治思想大师》一书所推出的强大阵容中,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占到了一半以上。迈克尔·史密斯认为:“古典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学者主要有爱德华·卡尔、基督教现实主义大师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尼古拉斯·斯巴克曼、马丁·怀特、约翰·赫兹以及雷蒙·阿隆。”^①

二战爆发后,以汉斯·摩根索等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学派以批判理想主义的方式将“权力政治”的话语符号再度拉回到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中。在对理想主义理论批判的过程中,现实主义首先认为,理想主义者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将假设的国际政治应该怎么样当成现实的国际政治本身怎么样进行研究。将自身的理想等同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一切理想主义学者们的共同特点。

古典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全面反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现实主义者认为人内生性权力冲动是普遍的,因此,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仅仅是可以依靠权力所限制,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弭^②。其次,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进步不是线性递增的,而是呈现出螺旋缓慢变化趋势的。这种变化有如“布朗运动”,其方向性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与停滞。再次,现实主义学派注重权力对利益的影响,认为世界和平的保障不是利益和谐的结果,而是在权力约束下利益相互牵制的结果。最后,现实主义学派认为,理想主义学派所提出的依靠国际法、集体安全原则和国际舆论来确保和平不论是在二战的现实层面,还是在理论逻辑层面都是不可行的。只有基于长远的世界政府或中短期的外交调节下的权力均衡才能确保国际社会不会再度陷入到整体的失序之中。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冷战序幕的拉开,理想主义因其在历史上的糟糕表现尴尬地退出了国际关系理论舞台的中心。虽然后世再无任何学者敢自称是理想主义者,但是,理想主义的退出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理论的死亡。20世纪70年代强势登场的自由主义流派很大程度地继承了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理论衣钵(参见表1)。例如,制度自由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理想主义理论中“创建国际联盟”的思想,贸易自由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理想主义理论中的“消除贸易壁垒与公海航行自由”的思想,民主自由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理想主义理论中的“民族自决”的思想,观念自由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废除秘密外交”的思想。当新自由主义理论用科学的外衣再度将理想主义进行包装上架后,第二次理论的论战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新新争论”与“新新融合”。

①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美]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表1 新自由主义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继承关系

新自由主义流派	理想主义“十四点原则”
自由制度主义	创建国际联盟
贸易自由主义	消除贸易壁垒与公海航行自由
观念自由主义	废除秘密外交
民主自由主义	民族自决

2.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理想主义的衣钵,而新现实主义则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两大理论流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论战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推向了第二个高潮。这场学术争鸣最终以两大流派形成的妥协与融合为结束,宣告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到稳定成熟的发展阶段。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古典现实主义遭到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联合攻击背景下的一种回应。理查德·莉特尔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反攻”^①。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者,新现实主义,也称结构现实主义或防御现实主义,在保留了古典现实主义文本内核的前提下,通过对微观经济学与行为主义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吸纳而对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进行了三点大的修正。第一,在构造理论的核心假定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将人性中内蕴的权力冲动作为国家追求权力与获得安全的逻辑起点。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构成了国家间追求权力与获得安全的逻辑起点。第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背景本质上是“霍布斯体系文化下”的“丛林法则”。古典现实主义中倡导的强权政治逻辑与斗争主义范式注定了这一理论在结论上的悲剧性。而相比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的“自然选择”逻辑,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背景本质上强调的是“洛克体系文化下”的“主权零死亡时代”。通过将“国家与体系关系”比拟为“公司与市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新现实主义已经承认,即便是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的行为体,也仅仅可能被理解为“失败国家”,却不可能被真正的淘汰。第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坚信,只有建立起统一权威的世界国家才能给国际社会带来长久稳定的秩序,而新现实主义则明显看到民族主义时代构建世界联邦共和国的不现实性,并提出“权力均势”是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根本原则。

随着新现实主义的强势回归,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支力量新自由主义展开了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论战。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宣战是以 1986 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该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的四个主要章节。第二部分是对沃尔兹理论的四篇批判性文章。这四篇文章分别是约翰·拉吉的《世界政体的连续与变革》、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和社会秩序》以及理查德·阿什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第三部分是新现实主义家的回应。主要有罗伯特·吉尔平的文章《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宝库》以及华尔兹对批评者的答复。华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地位的

^① Richard Little. Structuralism and neo-realism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5: 74.

确立、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静态性的批判以及新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批判的应战成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关系理论蓬勃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基调。

第二次大论战的焦点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新现实主义仍然倾向于沿用古典现实主义“国家本体论”的视角看待国际政治。而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现代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多元化使得国际组织等新的行为体有着更多的话语空间。第二,新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层面的“体系结构性”,而新自由主义认为,痴迷于静态的结构性使得新现实主义不能动态的描绘变化的世界本质,因此,新自由主义更加关注于“体系进程性”。第三,新现实主义认为安全仍然是国家在国际社会行动的重要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福利而非绝对的安全。第四,由于新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国家间的相对权力位差,所以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合作的相对收益是国家关注的核心。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合作的绝对收益应该是主权行为体进行合作的根本动机。第五,新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意图与观念对国家安全影响更大。最后,新自由主义继承了理想主义的情怀,通过贸易自由、民主化和国际制度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相互依赖中走向合作与秩序。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历史不过是在旧的面孔上涂抹上新的化妆品。不论未来国际社会如何发展,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均势的权力斗争都会反复再现。^①

1988年,约瑟夫·奈发表了一篇对本次论战总结性的文章《国际组织与国家权力》。^②以这篇文章为标志,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过十年的争论中取得了除核心假定之外的理论合流(如表2)。两种理论的妥协与融合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了新的成熟高度,同时一个崭新的理论学派——后实证主义理论的兴起又对刚刚形成的“和平局面”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表2 国际体系的两种模式

理论流派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核心关切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世界观	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	国际社会、符合相互依存
主要单元	民族国家	国家及国际组织
行为动机	国家利益、安全	国际社会利益
体系发展趋势	循环	向善
政治学逻辑渊源	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3. 实证主义理论与后实证主义理论的论战

“新新融合”的太平局面并未表明国际关系理论趋于定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解构主义思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美式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巴黎手抄学派、北欧学派、女性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后实证主义”学说对传统“实证主义”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一次论战不是以两大学派对立为特征,而是在以相同研究方式为基础组成的学派集团之间进行的。新现实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结成学术联盟共同应对以建构主义理论为首

①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 1989; 16.

的后实证主义研究集团凌厉的进攻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可以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后实证主义时代”。此后的十几年中,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否定被一般界定为实证主义之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对传统或主流依靠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理论全面批判与重构。^①

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观察。19世纪初,法学社会学家奥古斯都·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第一次提出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世界并发现社会规律的观点。而后实证主义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反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同时也反对理性人假定、现代性和启蒙传统。后实证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来便开始了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批判。领导这一趋势的主要学者有理查德·阿什利、玛莎·费丽莫、罗伯特·考克斯、亚历山大·温特、尼古拉斯·奥勒夫、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这些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从自身的本体论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使得实证主义理论只能看到国际政治特定时段内的某种特定画面。这种被人为框定的理论在复杂的世界本身面前充满了局限、片面与狭隘。此外,后实证主义并不认为社会世界存在着普遍、唯一的规范,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简约使得原本复杂与多元的世界被人为地扭曲。后实证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重新发现了将主流理论所长期排斥与裁剪的“边缘性问题”的社会意义。

后实证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解构现有主流文本的合理性而重新建构国际政治研究的议程与话语符号系统。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单纯的“只破不立”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在后实证主义中堪称典范的建构主义追求的是“破而后立”的理论重建。建构主义从观念本体论出发来探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的形成问题。通过对社会规范、身份认知、文化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观念与文化的产物。而国家正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文化理解与角色等建立起与他者之间的身份与利益认知的。在决定行为体行为方式问题上,主导性的共有知识分配、身份认同要比物质实力本身更重要。正如一柄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研究宝剑的杀伤力不如去研究握剑人的意图。因此,建构主义反对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对物质实力的过分关注与痴迷,提出了“观念与价值赋予了物质实力以社会意涵”的说法。^②

此外,后实证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对实证主义理论的批评表现为两点。第一,“逻辑的真实”在理论的构建中要重于“历史的真实”;第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从现实的结果中去归纳出理论,理论只能在逻辑中被推演和证明出来。历史归纳与类比作为最朴素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式,它在逻辑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归纳永远都无法周延。因此,后实证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带有明显霍布斯主义血腥杀戮与殖民并吞的“历史的真实”去否定未来国际社会向善发展的“逻辑的真实”的可能性。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每个理性的经济人为了提高收益都会选择改进技术来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了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最后导致产品价格降低。我们也不能由于产品价格降低的事实来推出市场参与者的目的是减少利润的结论。因此,后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倡导社会规范在主体间互动中的建构作用,同

① Steve Smith, Ken Booth, Marysia Zalewski, 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时,还因其在方法论层面上带有强烈解构主义的逻辑思维而蜚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界。

面对后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至今仍然没有作出深刻而有力的回应。被称为当代国际关系界现实主义翘楚的修正现实主义理论家斯蒂芬·克莱斯勒对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的回应仅仅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说些什么。不论他们说的怎样动听,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切切实实的东西——例如大炮、黄油——是观念所不能取代的。而正是这些实在的物质构成了大国影响国际政治的根本资源。”^①新自由主义更是由于其理论倾向上同后实证主义理论的亲缘关系而选择了适应性融合。因此,第三次论战与其说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主流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面对后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场不作为的“绥靖”。由于二者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完全背离,因此,在这个一开场就妥协的局面中,进入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基本呈现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左中右三大范式分足鼎立的基本局面。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次大论战,也经历了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同政治学的融合并借鉴了政治学的逻辑,第二次是同经济学的融合并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第三次是同社会学的融合并借鉴了社会学的逻辑。我们可以欣慰地发现,每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界大的辩论和融合都会推动我们的学科走向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一个成熟的学科的重要标志不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开宗立派的大师的涌现,而是在大师之后,我们沉淀与结晶出许多宝贵的思想与智慧,这些思想使得后面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学习而同大师们产生同样的感悟与人生共鸣。

(二) 理论预测的两次大失败

人们之所以关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让人们长期保持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兴趣的原因并不是在这一领域能够轻易地取得成功,而是在这一领域很难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重大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次致命的失误,这两次失误没有使人们丧失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信心,反倒成为学者们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上面提到的两次预测的大失败分别指的是: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冷战结束,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所表现出的茫然与无所适从。

1. 理想主义面对二战爆发的无助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失败就是一战后理想主义没有成功地对法西斯主义崛起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威胁给予足够的认识,并且该理论没能成功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将欧洲一代年轻人的鲜血涂在了战场上。战后随着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欧洲和世界的发展,以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为首的欧洲大学生们举行了“永不再战”的联合签名^②,一时间欧洲地区的人们都确信未来将永不再战。

理想主义为欧洲人带来的“和平主义思潮”使得欧洲人普遍相信每个理性的人都不愿意再度卷入战争之中。当英法等大国中“每个试图提出对德强硬的政治家都在下次选举中

^①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② 二战后的一项统计表明,当年签名的大学生中有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重新走向了战场,并有近50%的人死在了战场上。

被盲目追求和平的选民给轰下台之后,留下的就都是些只懂得讨好选民的见风使舵的政客了。”^①伴随着和平主义思潮的是一种“理性相符”的认识逻辑,这使得整个欧洲包括英法领导人们都倾向认为希特勒也是一个为了讨好国内选民而胃口有限的理性政治家。面对纳粹德国一次次的权利声索,以英法为首的国联希望通过满足其有限而理性的利益需求来防止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如果希特勒是理性的,那么英法的绥靖政策无疑是一种在现有机制内为崛起者提供上升渠道的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当一群理性的行为者面对一个非理性的人,并且还假定这个非理性的人同他们一样也是理性的,就可能产生基于认知误判所带来的重大失误。因此,战后有人认为,如果当希特勒得到苏台德区、甚至是合并完奥地利之后就马上死掉,那么他无疑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因为那些成就早已达到了一个国家理性所能触碰到的一个极值了。

不论怎样,理想主义所提出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和“国际法庭”都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对世界秩序与国际和平的破坏。每当人们想到国际联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软弱、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软弱、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之时,“以权力限制权力”、“军事联盟政治”、“权力均衡”等现实主义逻辑就会再一次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聚光灯下。

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想主义在近代的失败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失败,更不等同于理想主义理论的死亡。由于这些学者们提出了一套远远超越于时代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互动逻辑,使得二战前“早产”的理想主义没能够适应那个时代的环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冷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和冷战后的建构主义其内核中都深刻地镌刻着理想主义学派的思想。这些理想主义者是一群真正的登高望远的理论家,虽然他们没能够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国际联盟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反映着我们自己。照镜子的人不能因为自身的相貌问题而去抱怨镜子。因此,每当有人抱怨理想主义理论辜负了人们的期待之时,人们是否也应当反思是否是人们背叛了当年建立国联时自己的理想。

2. 新现实主义面对冷战结束的茫然

1986年,新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结构》一文中阐述到:“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解释的历史局限。我的理论认为两极格局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至少将主导未来20年的国际政治现状。”^②这句明显带有大师自谦性的表述言犹在耳,五年后的1991年底,国际体系中的另一极苏联解体了。伴随着沃尔兹学术声誉的一落千丈,国际政治理论也受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致质疑与诟病。事实上,最先提出“苏联解体论”的是美国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而国际政治学界作为研究两极权力格局的最重要的学科,却没有一个人成功地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像许多重大国际事件爆发一样,虽然事后也有许多诸葛亮式的人物声称自己早已发现两极结构存在的严重缝隙,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真正地在此前写过关于两极大约何时坍塌的预测性文章。

两极结构就在新现实主义“两极稳定论”的坚定声中忽然坍塌了。就在新现实主义理论面临重大危机而茫然之时,新自由主义伴随着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民主和评论”扛起了冷

① 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② Kenneth Waltz. *Political structures* [J].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1986: 73.

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大旗。由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生长在独立的学术根系之上,它仅仅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与修正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学术枝干。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面临危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空白之处的有益补充和拯救。虽然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两极解体后受到了巨大的质疑,但面对刚刚形成的单极世界和人类社会未知的走向,所有社会科学的学者们都意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更加成熟与精密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次新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大失败反倒又一次推动了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与分化。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了追求简约而将大量不可计量的因素排除在外。因此,其理论只能解释体系层面的问题,而不能对单元层面(如苏联国内政治解体)进行充分的预测。理论本身就是片面中谋求深刻。因此,过多地苛责沃尔兹和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是没有必要的。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牙医没有治好一个人的关节炎而质疑牙医的水平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解释一片落叶的飘落轨迹而认为牛顿的理论没有价值。作为一种视角和观察世界的框架,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解决包括单元国内政治在内的一切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理论的价值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全面总结,而是在于内蕴的逻辑的美感。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失败仅仅是结论上的错误,而其内在的科学主义推导过程在国际政治历史发展进程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也是很难被超越的。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政治宏观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一直以其科学性与严谨性而著称。也正因如此,冷战后的新现实主义在众多国际关系学者的修正下重新作为重要的一员而回归到国际政治理论的舞台之上。

二、主流理论的逻辑演进:在权力与价值之间

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脉络主要可以被概括为从现实主义“不这样做会失去什么”的逻辑,到自由主义“这样做会得到什么”的逻辑,再到建构主义“身份决定我应该这样做”的逻辑。每一种范式的提出都是对前面的修正与改进,每一种新的范式都是对现实政治实践认知的加深。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九十多年里,主导性逻辑也经历了从“权力”到“利益”再到“价值”的路径演变。正是这些概念元素构成了帮助我们今天观察与描绘国际关系的基础。

(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罗伯特·吉尔平曾经说过:“将一些形形色色观点迥异的人汇聚在一起,并给他们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人对人类社会前途在认知上的悲观意识。”^①“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构建国际秩序”是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学者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基于不同的假定基础上形成的现实主义者们对国际秩序建立所开出的“药方”却是存在差异的。根据不同的假定侧重,本书将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划分为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修正现实主义四种。

1. 古典现实主义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人们普遍认为,近代古典现实主义的第一个实践者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而真正开创现代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应该是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和汉斯·摩根索

^① Robert G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4(02): 287-304.

的《国家间政治》。这两本关于“权力”、“利益”、“均势”、“主权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论述,开创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先河。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人性恶为基本假定,认为人的内生性权力冲动如果在国内政治中受到压制,为了寻求权力冲动的替代性满足就可能促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释放权力冲动。由于主权国家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基本互动前提,而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是一种有限的稀缺产品,因此,无限的国家欲望与有限的利益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的矛盾。在无政府状态下,这种矛盾很容易演变成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为了降低国际冲突,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认为:“从长远来讲,建立一个带有公共权威的世界政府是实现秩序的根本方法。如果短期内无法建立世界政府,依靠审慎的妥协和外交调节则是避免战争的重要手段。”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遵循人性的基本法则而充满了权力间的斗争。“以权力限制权力”和“实现暴力之后的正义”的强权政治逻辑是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标志。虽然许多人认为当代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大厦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只要看一看发生在中东地区阿以之间的冲突就可以发现,权力政治逻辑并没有像天花病毒一样完全地被这个世界所封存在思想的实验室中。每当战争的阴云在世界某个角落出现,我们都会想到摩根索临终前的那句忠告:“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人存在,关于权力的斗争就永远不可能消失。”

2. 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或防御现实主义。这种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单元的行为方式与互动结果。关注物质实力分布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大特征。在保持现实主义以经验为依据的观察上,国际关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关系所组成的,新现实主义者指出这是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架构造成的。他们拒绝解释国家内部的特征,主张国与国之间因为相对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对抗权力的集中。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试图采取科学和更为实证性的方式。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普遍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是肯尼斯·沃尔兹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

新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本体论以及权力决定论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超越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创新。首先,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的内生性权力冲动,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失序;其次,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体系中追求的最大利益是安全,因此,权力不是国家追求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是获得安全利益的一种手段。新现实主义认为,当国家过度地追求安全,就可能带来基于体系制衡逻辑下更大的不安全;第三,为了增加理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新现实主义抛弃了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权力分布中民族性、国家意志以及国际道德等不可计量变量,而仅仅关注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最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摩根索认为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是维护国际秩序的根本手段,这本质上是“单极稳定论”或“霸权稳定论”。而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即便是有统一的政府也很难避免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与派别间的内战。所以,两极结构以其简单易懂的强大可能成为未来维护世界秩序最稳定的手段。^①

作为国际关系的宏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并不对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关注。也正是由于结构现实主义拒绝对单元内部的变化进行研究,而仅仅关注体系层面的权力分配状况,因此,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研究很少出现单纯用结构现实主义变量去解释复杂国际问题的情

^① 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08 - 137.